

AI能否成为作家

小饭

我们似乎生活在小说的黄昏。身处时代中的文学青年不禁伤感。何以解忧，唯有刷短视频。

最近华东师大传播学院的王峰教授带领自己的团队借助AI完成了百万字的小说《天命使徒》。好得很，按照AI不食人间烟火的特性，它可以避免老病死，小说似乎因此可以永生。哪怕海枯石烂，地球毁灭。如果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从这个角度，王峰教授和他的团队可以算救死扶伤，弃文从医。但AI真的可以成为作家吗？不少人有疑问的。

我是赫伊津哈的读者。《游戏的人》在丽江河畔曾一笔一画构建了我人生观的一部分。文学写作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个游戏——赫伊津哈会同意我的观点。拥有游戏性是我投身写作的重要原因。华东师大有个作家群，我忝列其中与有荣焉。现在这个作家群里多了一位成员，我有个建议——我们要为这位新朋友取一个笔名。《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的主人公奥德曼，来源于音译old man。但意译的话是指“古老的人”。如果未来依旧可以被今天的我们所想象，那这位作家的笔名就叫奥德曼吧，作为奥特曼的兄弟——如果写小说的作家AI有个笔名，我会觉得这件事更有意思。然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

每一个笔名都是一个特殊的容器。如果AI能写作品，不同的AI能写出不同的作品来满足不同人群的审美和思维训练的需求吗？比如我期望未来AI能写出我爱看的符合我审美情趣的作品。文学和其他样式的艺术一样，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审美的快感和思维的乐趣——或者说启发性。布拉德·皮特演过一个电影《巴别塔》，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无法彻底有效沟通。理解与沟通是文学的母题，也是天职，同时还是小说作者力图与读者达成的目标。好的作品经过了时间检验，其检验过程就是在每一条人生必经之路上，在情感和理性的考验之中，给予读者共鸣与合唱。那么AI小说让读者共鸣与合唱，目前来看可能就是几个难点。因为AI大量抓取了过去的经验和输出，但不是个体化的——这导致它在趣味性上永远无法独立发展。比如，伦理正确恰恰是这个时代文学的某种困境，AI能总结出文本的主要观点和事实，但我们期待的是“认知障碍和信息不足的对抗性阅读”。AI如果做不到对用户认知模型和知识结构的掌握，那它的提炼基本上打动了不读者。小说有趣味性且风格化。村上春树和海明威、马尔克斯，乃至余华王小波，并不能赢取一切读者。金庸和琼瑶拥有大量读者，但依然只是某一种文学。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AI像一位生活经验很丰富的山里的老人，同时在某些时候还像一个城市里的少年。读者通常的期待是AI能创作出某种以刻骨铭心的姿态参与进个体生命的故事，这个故事情节以一种特殊储存的形式留在了一个人的生命里永远无法抹去——耳帝说过的作品像是穿越了十几年的光景又点亮连通了当下的恍惚而补全了记忆的地图，那里面切切实实地饱含着生活与成长、经历与爱的所有的属于一个人的历史。

我期待AI快点写出这样的作品来。容易理解的是，当作家毕竟辛苦，当读者是最幸福的。

着一帮工人在工地上加紧干活儿，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会抽空赶过来。

中午，小陈真的来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开着大卡车的。我异常惊讶，星期天的淮海路上，这大卡车，他是怎么开过来的呀！一身工服，一脸汗珠，他对我说：你就别担心我是怎么开过来的了，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我怎么也得来看看你呀！然后，他笑着又对我说：不是开着这大卡车，我还真的过不来淮海路了呢，它是我的通行证！

从来没有一个人，只为了看你，竟然是开着大卡车，穿过喧嚣的闹市，隆隆响着，赶了过来。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知青的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让人意外，真挚又真实，感动并感叹。那是因为有青春时节的滋养，有漫长时光的磨砺，让这一份友情打上了岁月结实的包浆，才会给你一个出其不意的意外惊喜，如魔术师蓦然间变出的一捧鲜花，芬芳在你的眼前和日后长久的记忆里。

上海知青！

的是满满一箱子书，虽不是珍奇的版本，却藏有我青春时节蠢蠢欲动的文学梦。知青带去的箱子，都放在队里用茅草搭建的简陋窝棚里，下了这么大的雨，窝棚肯定被雨浇得漏成了筛子眼儿，我人又不在队上，我那一箱子书，还不都让雨水泡烂了呀。

宣传队休整的时候，我请假赶紧往七星河往队里跑。回到队里，先着急忙慌地要去看我那一箱子书。同学对我说：放心吧！早有人替你保存好了！便是小林。尽管雨中收麦子那么累，一身湿淋淋的衣服没换，先跑进窝棚，用厚厚的草帘子，好几层替我把箱子像包粽子一样，包得严严实实的。别看他不言不语的，知道那一箱子书是你的命根子！同学又这样对我说。

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一箱子的书好多散失了，仅存的几本书页间残留的雨水潮湿的黄渍，清晰还在，斑斑物证一样，书写着小

林对我的情谊。小童也是上海知青，在我们队上所有女知青中，她长得最漂亮，个头高挑，亭亭玉立，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那一年，我被调到团部编写知青诗选，缺一个会刻钢板的人，我推荐了她，和她相处了一个来月，心里暗想，这样秀外慧中的好女子，不知哪个男知青有福气能够娶到她？娶到的是我们队上的统计小陈，也是上海知青，人长得英俊挺拔，和小童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不仅我一个人，几乎全队的人都觉得，没有比他们更般配的了。

我和他们两口子很熟悉，他们到北京，我到上海，总要见上一面叙旧。那一年，我到上海淮海路的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很多队上的上海知青来捧场。小童自然也来了，没见到小陈，一问才知道小陈在加班。我知道，小陈已经是一家单位的基建处的处长，大星期的，还要加班。小童告诉我，他正带

上海知青

肖复兴



小林是上海知青。在北大荒，我们在一个生产队。他不怎么爱说话，就是闷头干活儿。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只会闷头干活儿，在队上头头那儿，不得烟抽。上海知青一般不仅能干，而且说话甜，很有礼貌，不少人很快就调到机务开拖拉机康拜因，那时，流行一句俗语：上机务，下农工。小林一直在农工班干农活，夏天收麦子，秋天收大豆，冬天到七星河修水利。

我和小林不熟，来往不多。那年，我暂时调到团部宣传队，干了小一年。夏天，北大荒常有暴雨来袭，麦收时候，来得最多最猛。那一年来得尤其猛，连续好多天下个不停，老农说天要漏了！麦子都泡在雨水里，拖拉机康拜因无法下地，收麦子，只好人工干。管雨人手一把镰刀，冒雨下地抢收麦子归仓。我奉命写了个小节目《小镰刀战胜拖拉机》，在三江平原到处演。麦收结束，演出完毕，雨季过去了，长舒一口气，算是消停了。忽然想起我的那箱子书。从北京来北大荒，我带了两个箱子，一个箱子装

上初中时，我的语文老师课堂上常提“何其芳”的名字，总是把何的职务“文学研究所

“星火”何其芳

西坡

所长”挂在嘴边，似乎对他有些崇拜。在我这个懵懂少年看来，大概全中国搞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都归这个“所长”管。近50年前，“文学”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极高，高到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那么，“所长”的厉害程度想都不去想。

后来明白，所谓“所长”，不是如今“创意写作班”导师，而是要管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的领导。学界流传“何其芳的理论加钱锺书的材料”乃做学问之最高境界，真不是开玩笑，只须证诸何其芳的《红楼梦》研究，信然！当“中国梦现代文学史”成为我的一门功课课时，“何其芳”三字写在里头。那时教科书里，可以没有钱锺书、张爱玲、穆旦，不可不提何其芳。

1936年对何其芳来说是里程碑：3月，《汉园集》出版（收入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确立了他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次年，首届并且是，唯一一届的“大公报文艺

人们都知道“龙盘虎踞”是对南京地理的赞美，却不一定知道“龙盘”指的是钟山，而“虎踞”则指的是“石头城”。而石头城更有一个狰狞的别称，叫作“鬼脸城”。

这鬼脸石头城，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公园内。它坐落于南京清凉山西麓的秦淮河畔，自虎踞龙蟠石头城门到草场门全长约3000米。盛夏时节到这里去，感受着到处的郁郁葱葱以及从绿荫中里盈透着丝丝的凉意，不觉心旷神怡。在这里看江水南下，眼前豁然开朗，只见清凉山西部崖壁被滔滔水浪冲刷得如刀削斧砍一般，紫红色的砾石裸露在外，形成“峭立江中”的天生石壁。其中一段石壁因风化作用，出现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怪状，酷似一张狰狞的“鬼脸”。怪不得这段石壁以及沿石壁建造的石头城被叫作“鬼脸城”了。

石头城始建于楚威王七年（前333年），原为楚威王金陵邑。东汉建安十

交重庆群益出版社；9月，《星火集》问世，初版1000册，由廖冰兄装帧。全书共4辑，第一辑收录1938年在成都从事抗日救亡文化工作的感悟，含《论工作》等7篇；第二辑收录从成都赴延安及在延安和前线的见闻，含《川陕路上杂记》等6篇；第三辑收录对生活道路和思想感受的回顾，含《一个平常的故事》等5篇；第四辑收录《关于艺术群众化的问题》等4篇论文。

1938年8月，26岁的何其芳已站在延安“鲁艺”的讲台上。很多文学爱好者对其抛弃“唯美-象征主义”转向拥抱“现实主义”的标志性作品的兴趣可能很大。何其芳大学同学卞之琳说过，何的“文风从他《还乡杂记》开始的渐变来了一个初步的突变。与思想内容相符，他的笔头显得开朗、尖锐、雄辩”。这个评述当然权威。不过，卞先生恐怕忽略了一件事：《还乡杂记》是何其芳把1936年9月29日至1937年6月11日所写的8篇文章编成一册寄往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由于出版状况频频，竟至1939年8月才出版。因此，这部作品与何抵延后的创作毫无关系。那么，真正能体现其那种“转折”的关键之作是什么？是《星火集》！

1945年初，何其芳从1938年至1944年发表的文章中选取20篇，再加上2篇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连同“后记”，哀成一集，送

夏走石头城

许桂林

长江水就在石头城墙下。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于洪武二年兴建城墙，此处石头城便成了南京城墙的一部分。石头城被人称为“鬼脸城”究竟从何时开始，这称呼究竟是怎么来的？

一种说法是相传三国时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曹操亲率十几万大军沿江顺流而下，悄然无声，直奔秣陵（今南京）偷袭而来，当他们的战船来到城墙伸入水面的城下时，准备突袭的将领忽然看见城墙上出现了一个极恐怖的脸，黑暗中就像是一个面目狰狞的鬼怪，正怒目而视地出现在他们的前面。顿时所有的人都吓呆了，于是不敢开战，连夜撤退。从此这个南京城墙上的鬼脸也就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鬼脸城”。

我很看重自己收藏的初版《星火集》，不光缘于土纸印刷，时代特征异常鲜明，还因为它后来多次再版，里面的文章不断被调整被修改，不复原汁原味了。不禁感叹：吾之“星火”，何其芳菲。

我生于1934年，195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3月，驻军二十军教导团招募学员，我瞒着父母悄悄报了名，被录取为卫生兵。母亲见我决心坚定，也只能同意。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二十军从嘉定出发北上待命，学习生活也因此中断。1950年11月，我们军随九兵团入朝参战。一个多月的战斗，在长津湖畔重创美国王牌军——陆战一师。由于我们的武器落后，粮食供不上，又遇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极端寒冷天气，我方伤亡较大。在朝鲜战场上，无数老战士和共产党员吃苦在先，冲锋在前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其中一名共产党员、我的直接领导——营部卫生所刘军医让我永远难忘。刘军医早年参加革命，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直至抗美援朝，他是营部的支部委员，是最崇敬的领导和战友。他经常关心我的进步和成长，鼓励我“要好好干，争取立功，以后加入党组织”。在一次敌机空袭驻地时，他奋不顾身冲进屋内把一箱药品抢救出来。而他自己因胸部重伤不治，牺牲在送院途中。那

时物资极度缺乏，关系到全营战友生命和健康的一箱药，在他眼里无比珍贵，胜过了自己的生命。1952年10月，我们九兵团回国了，我又回到了师部医疗队。但是，我永远忘不了牺牲的战友，刘军医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里像“过电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像他那样争取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我努力工作，195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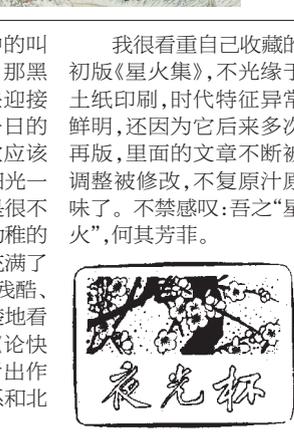
活。我认为到了连队，首先要放下官架子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老老实实当好一个小兵。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动全班排同志完成好任务。在这一年的总结会上，我在所在班组被评为先进班组，我个人又一次荣获三等功。一年的下放锻炼结束，我回到原单位任职，背包里除了带去的《入党宣誓证》，还多了一张立功证。但我的最大收获不是证书荣誉，而是对基层官兵的感情更深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选择了“复员”，离开了部队。但这张《入党宣誓证》依旧一直伴随着我。其间，我经历了无数的工作调动，走南闯北到过全国6个省市。每当执行重大任务时、遇到困难时、人生重大转折时，我都要把它拿出来重温一下，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珍惜它、爱护它，视同个人的“革命文物”。



松下鸣琴图

（中国画） 宫保军



跟随着我69年的《入党宣誓证》

张金其

1954年连续被授予三等功。1955年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年6月被批准入党。在建党34周年的庆祝会上，我庄严地举起右手，在党旗前宣誓。当时，每位新党员都发了一份油印的《入党宣誓证》。我将宣誓证小心收藏起来，时刻提醒自己，入党后仍不能松劲。三年后，军内掀起了军官连队当兵的热潮。许世友司令员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将军的行动坚定了我当兵锻炼的决心。下放的单位是本师下属的一个团，任务是“国防施工，构筑地下坑道”，这是一项又脏又累的艰苦

十日谈

整整34年，在我年过半百的52岁，能入党，我怎能不激动！

责编：刘芳